

# 互主体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化基因及其创新

成龙<sup>1</sup>, 陈婵<sup>1,2</sup>

(1.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2.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浙江诸暨, 311800)

**摘要:** 互主体观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基因, 它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独有的精神气质, 突出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天人观, “群己合一、成己成人”的人我观, “形神一体、身心和谐”的身心观, 使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与西方现代化迥然不同, 并因而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互主体观; 中国式现代化; 天人观; 人我观; 身心观

**中图分类号:** D616;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3-0037-12

文化是各个民族的生命力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sup>[1][5]</sup>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历史分野,在于西方文化倡导主客二分、自我中心的单主体观,而中华文化则追求多元共存、协同发展的互主体观。互主体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基因的核心,突出表现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天人理念,“群己合一、成己成人”的人我理念,“形神一体、身心和谐”的身心理念。这种互主体观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独有的精神气质,使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观、价值观上与西方现代化迥然不同,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然而,学术界至今很少有人从互主体观这一独特文化基因的视角去认识和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天人观的秉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sup>[2][277]</sup>与西方历史传统主张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天人分裂的思想不同,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理念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一、人与天地万物互为主体,人与天地万物不是绝对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异在者,而是差异并存、命运与共的对立统一体。成就万物、建构天人和谐之境界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这一理念和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独特而深邃的东方智慧。

### (一) 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一

古代农业“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收稿日期: 2024-08-22; 修回日期: 2024-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19ZDA016)

作者简介: 成龙, 男, 甘肃定西人, 哲学博士,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婵, 女, 浙江绍兴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联系邮箱: chenchan2006@126.com

关系的共识。中国古代各家学派虽然对宇宙万物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但是它们基本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一。《周易》认为,天地乃万物生命之源,因此称天为父、地为母。“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sup>[3](7)</sup>,“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sup>[3](20)</sup>,天地相合、阴阳相生,天地为一切存在的前提,有了天地才有万物,有了万物才有男女。《礼记》主张天是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根源。“万物本乎天”<sup>[4](489)</sup>,天被视为宇宙中的最高存在,万物的生成、发展和变化都受到天的影响。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sup>[5](108)</sup>,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天地万物是道的化身,道支配天地万物的活动,贯穿于宇宙万物之中。韩非子也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sup>[6]</sup>,天地万物尽管各有各的特殊之理,但道是万理之理,万物源于道,一切规律和法则都源于道、归于道。后世学者继承和发展了万物同源于一的观点。董仲舒、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基本赞同万物源于天地的观点,如周敦颐指出“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sup>[7](22)</sup>,天道既是世界的本源和本体,也是支配天地万物运行的普遍法则。王夫之主张万物源于道,指出“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sup>[8]</sup>,天与人虽在形与质上有本质的差异,但两者同出于“道”,人可以通过追求道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和谐统一。人与万物本源于一的理念凝聚了先贤们对宇宙起源和生命根本的深刻思考,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待自然、对待万物的根本态度——将天地万物视为独立的主体,也体现了人之主体与天地自然之主体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 (二) 人与天地万物同处一体

人与万物不仅同源于一,人与天地万物还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有机整体内,人与天地万物相辅相成,彼此共荣共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sup>[9](39)</sup>庄子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指出天地万物与人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关系。董仲舒认为天生长万物,地养育万物,人成就万物,主张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sup>[10](194)</sup>,人与天地万物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王充虽不承认董仲舒“天人一也”的观点,但主张天人皆“禀元气”的统一性,“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sup>[11]</sup>,人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于统一体中,同样受到宇宙规律的支配。张载、二程、王阳明、王夫之等后世大儒均赞同人与天地万物同处一体的观点。如,张载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sup>[12](65)</sup>,认为人可以通过尽心至诚探究宇宙的规律和道理,达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体现了对天人整体的尊重与敬畏。王夫之认为天、地、人是宇宙的三大要素,“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离者也”<sup>[13]</sup>,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宇宙的整体。先贤生动的诠释不仅是对天地万物存在的整体性理解,也是对人与自然有效互动的深切体悟。人并非置身于外在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天地万物演化进程中的有机一环,人与天地万物是共生共存的统一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人要洞悉天地万物的规律,知己知彼方能和谐共存。

## (三) 人与天地万物各居其位

在天地万物为整体的整体结构之中,人与天地万物差异共生,各有其独特的位置、天性和生养之道。《周易》曰世间万物统属于天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sup>[3](7)</sup>,即天道虽变化莫测,但其有自身规律,若天地万物能协调并济、和谐共处,就能大吉大利。老子认为世间万物有各自的本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sup>[5](84)</sup>,严格界限、相互尊重、各守本位就没有危险。他推崇道化生万物而不占有、德养育万物而不自持、长养万物而不主宰的互主体意识,以矛盾对立转化的辩证法论述了天地万物以他者为主体方能长久的深刻哲理,“天地所以能

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sup>[5](18)</sup>。庄子继承老子思想, 指出天地各有其主宰, 阴阳各有其居所, “天下有常然”<sup>[9](165)</sup>, 即万物各有其自然本性, 人顺自然之理, 便能安享太平。墨子赞誉“天之行广而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sup>[14](22)</sup>, 人们要以天为准则, 效法天的兼容并包、尊重万物、容养万物的无私精神。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sup>[15]</sup>, 万物各有差异、各得其所, 则可以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董仲舒把天看成独立的主体, 认为天把爱利万物作为心意, 把长养万物作为职事, 天和人一样具有喜悦、愤怒之气, 悲哀、快乐之心, “以类合之, 天人一也”<sup>[10](445)</sup>。二程认为自然万物皆有其特点, “一草一木皆有理, 须是察”<sup>[16](193)</sup>, 尊重万物的主体性地位与差异性特色, 万物方能相互成就、各得发展。“人与万物各有其位”的理念让人类正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进而对差异并存的自然万物予以充分的理解、敬畏与尊重, 认识到人与万物应该相互成就、协同进化。

#### (四) 建构互为主体的天人和諧之理想境界

人与自然万物同为一体、各在其位, 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而是互为主体的生命共同体。早在西周时期, 人们就意识到要尊重自然万物的主体性, 遵循其生长规律, 保有其生存空间。《逸周书》记载周文王告诫其子“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以成草木之长; 川泽非时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 不麝不卵, 以成鸟兽之长。畋渔以时, 童不夭胎, 马不驰骛, 土不失宜”<sup>[17]</sup>, 这表明中国人在这时已经有了天人、物我的互主体意识。这一理念在《孟子》《荀子》等著作中均有体现, 为后世诸多学者所继承。朱熹指出, “圣贤出来抚临万物, 各因其性而导之……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者, 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sup>[18](273)</sup>。同时, 世间万物相依相存、相互转化, 物壮则老、物极必反, “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 功成而弗居”<sup>[5](5)</sup>, 老子提出要尊重和顺应万物的本性, 不强加自己的意志和私欲, 自然万物就能和谐共存。庄子的文章中充满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的憧憬与追求。“万物群生, 连属其乡; 禽兽成群, 草木遂长”“族与万物并”<sup>[9](171)</sup>等表述形象描绘了相互尊重、万物并育的朴实纯真的景象。当然, 建构互为主体的天人和諧之理想境界的关键还在于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天地抚育万物之胸怀为楷模, 不仅实现自我, 还要成就万物。《中庸》认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sup>[4](1029)</sup>, 天地对待自然万物诚一不二, 天才能孕育万物, 地方能承载万物。人应“大其心”, 效仿天地之至公无私, 至为真诚尽性地对待自然万物, 充分尊重和发挥自然万物之主体性。“以物观物, 性也。以我观物, 情也。性公而明, 情偏而暗”<sup>[19]</sup>, 尊重天地万物的本真天性, 敬道慎为、道法自然、至诚尽心, 方能达到与天地万物共荣共生的理想境界。

在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互主体天人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sup>[20](161)</sup>等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相契合,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新型天人观, 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了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这一观念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全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和探寻人与自然共荣共生之路。

首先,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同出一体、同处一体, 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体。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美好图景中, 人与自然相互交融, 是共同实现现代化愿景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党和国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国家发展全局,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系统谋划和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党和国家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宗旨要求,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实现了人类生产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人的需要满足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 既是人与自然互

为主体观念的体现,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明了建设方向。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保驾护航,“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sup>[21](38-40)</sup>,并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sup>[21](137)</sup>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发挥自然的主体性与规律性,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让中国的生态、经济、社会等效益同步提升,实现了环境与人类、生态美丽和生活美好的有机统一。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sup>[21](29)</sup>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追求工业文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观点割裂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过分强调一方的主体性而彻底忽略另一方的主体性,并不能有效解决人类在工业文明进程中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矛盾。“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sup>[4](1007-1008)</sup>。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天人和谐的中和理念,提出并践行着“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sup>[2](10)</sup>，“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sup>[2](31)</sup>等理念,力求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关系的复归,克服了西方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对人和自然进行价值排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分裂异化的矛盾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以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为底蕴,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科学扬弃,注重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同进步,破除了生产力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立的旧思维和旧格局,走出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共赢的文明发展之路,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sup>[4](1036)</sup>整个地球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全球合作、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真正发挥地球上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天人和諧、万物并育”的理想境界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sup>[22](435)</sup>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针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给出的合理方案,既尊重和顺应地球发展的基本规律,也符合世界人民营造和谐宜居家园的美好期待。中国在坚持走绿色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同时,提倡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一方面,中国以身作则地提出并坚定履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另一方面,中国努力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倡导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绿色“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开启繁荣、清洁、美丽的生态文明新征程。

##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群己合一、成己成人”人我观的弘扬与升华

人我主体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议题。人我主体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等共同构成的我与“他”之间的关系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重。”<sup>[1](4)</sup>中华传统“群己合一、成己成人”的互主体人我理念反对主体间的对立与斗争,主张以平和的方式处理主体间的矛盾,倡导主体间的协调、友爱、合作与进步,视“他”为主体,为“他”着想,爱“他”如己,与“他”互相扶持。中华民族秉持的互敬互爱、成己成人、亲如同胞的互主体人我观,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和美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 (一) 互尊互敬乃基本前提

互尊互敬是构建互主体人我关系的基本前提。每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都是独立而有尊严的主体,要通过彼此相互尊重实现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老子认为上善若水、谦下不争即是对他人主体性的尊重,要像水一样以谦虚的姿态包容万物、尊重万物,“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sup>[5](20)</sup>。庄子极力推崇遵循人的自然天性,他通过“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等寓言故事论证了尊重人的本真的重要性。孔子提倡“修己以敬”<sup>[23](200)</sup>,即个体通过内在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修养,充分认识主体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对其他主体的真诚尊重和礼遇。同时,主体间互尊互敬的前提是“临之以庄”<sup>[23](19)</sup>,自己首先要有严格要求自己并且敬重其他主体的意识和行为,才能获得其他主体的尊重与爱戴。曾子指出“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sup>[24](44)</sup>,主体间的关系取决于自己怎样对待他人。孟子也认为“敬人者,人恒敬之”<sup>[24](186)</sup>,强调了主体与主体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原则,这种主体间的尊重与被尊重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构建起和谐稳定、互敬互信的主体间关系。二程认为敬这一道德概念是调解人我关系的根本,程颢指出“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何有不至?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智皆由是出”<sup>[16](81)</sup>。敬不仅包括主体外在的礼仪行为,更重要的是主体内心的态度和修养。朱熹赞同二程主敬的观点,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sup>[18](222)</sup>。在人我关系中,相互尊敬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人我关系才能够健康、平衡地发展。

### (二) 相亲相爱是基本要求

相亲相爱是互主体人我关系的基本要求。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不仅要关注自身需求,也要注重其他主体的福祉和需要。相亲相爱着重强调了主体之间的关怀和爱护。老子把“慈爱”视为“三宝”之一。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即要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sup>[23](2)</sup>,构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是核心。从家庭之爱推广到社会之爱,由近及远,由亲及疏,才能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愿景。《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sup>[4](1023)</sup>,认为君民互敬互爱能够使天下安定、万众归心。孟子倡导人要发挥自己先天的“善端”,推己及人,从而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sup>[24](30)</sup>,他的仁政思想体现了为政者与民众之间相互关爱的互主体关系。《管子》曰“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sup>[25](850)</sup>,若为政者醇厚待民、利益惠民,民众自然会领悟到为政者的良苦用心,进而形成上下亲和、社会和睦的主体间互动关系。晏子提出为政者要正己爱民,“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sup>[26]</sup>,指出爱民是最高尚的思想,乐民是最淳厚的行为。董仲舒认为人我关系的范畴是仁和义,仁要求施爱于其他主体,义要求端正自我,即“义在正我,不在正人”<sup>[10](319)</sup>,指出唯有正我才能安人,用仁对待他人和用义对待自我的要求明确了爱人与正我的关系。相亲相爱作为互主体人我关系的基本要求,强调了彼此之间的亲情与爱意,从而能够实现互相理解、支持和共融,促进个体和集体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 (三) 成己成人最高标准

成己成人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互主体人我关系的最高标准。这一观点认为“为己”和“为人”是辩证统一的,主体间可以通过互相体谅、互帮互助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己立立人”,关键是要以己度人、宽以待人。《尚书》曰“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sup>[27](392)</sup>,孔子主张“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sup>[23](210)</sup>，墨子提倡“君子自难而易彼”<sup>[14](3)</sup>，都指出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时，对自己要严格的要求，对他人应当宽容简约。“己达达人”的关键是甘于奉献、推恩于人。老子认为大道核心的精神就是甘于奉献，人要有道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sup>[5](127)</sup>的奉献精神，不索取占有、不恃功倨傲、不主宰他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墨子提出主体间应当“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sup>[14](225)</sup>，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双向启迪、共享财富，才能实现主体间的共同利益。孔子把实现仁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指出“忠恕之道”是仁之方的核心内容。“忠”即尽心竭力、尽己之心地爱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忠恕之道”就是要将心比心、为人着想，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衡量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成人与成己为一体。立己达人、推己及人、普济天下的理念为后世所推崇。例如，韩愈提出“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sup>[28]</sup>，二程认为“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sup>[16](124)</sup>。主体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的同时，还要关心其他主体的需求和愿望。主体之间相互体谅、相互成就，才能营造主体间共同进步、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

#### (四) 民吾同胞之理想境界

民吾同胞是互主体人我关系追求的理想境界。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理想世界始终承载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礼记·礼运》生动描述了“天下为公”的美好图景，为我们设想了一个国泰民安、和谐共融的理想世界。《尚书·尧典》描绘了各族内部、各个邦族之间团结无间、亲如一家的“协和万邦”的景象。老子乐于复归“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sup>[5](197)</sup>，这种自然而然的融洽给人以美好的启迪。墨子倡导“兼爱”“非攻”思想，主张尊重、保护他人、他国的主体性，要“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国若其国”<sup>[14](122)</sup>。他认为若能做到爱人如爱己，利人如利己，就能实现人人相爱、邦国和平的理想目标。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sup>[12](62)</sup>，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亲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王阳明认为君子“致良知”才能凭借内心的道德判断公正地辨别是非，体察其他主体的喜好与厌恶，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使主体间“视人犹己，视国犹家”<sup>[29](358)</sup>。民吾同胞、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充分贯彻互主体观的理想境界，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中华民族倡导“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大者宜为下”的谦下思想，为主体间的和谐共存和构建理想世界提供了诸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群己合一、成己成人”的互主体人我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理念不谋而合。“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质是构建互为为主体的主体间关系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弘扬“群己合一、成己成人”的互主体人我理念，形成了人我统一、互利共赢的新型人我观。理念引领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致力于推进国家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友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为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互惠互利、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sup>[30]</sup>。中国共产党在全面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将智慧奉献于人民、感情融入于人民、力量扎根于人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同时,充分尊重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作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sup>[21](28)</sup>。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将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多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是确保广大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主体地位的重要方式,能够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活力、凝聚人民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创新,加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机制建设,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国家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友爱,实现了个体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是构建互为主体的主体间关系社会的基础。共同富裕理念主张个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扶持,“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sup>[31]</sup>。全体人民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参与主体,也是其发展成果的共享主体。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或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牺牲部分社会主体的利益,或是片面依赖高福利而无法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国情,聚焦十四亿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实现,设定了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确引导和规范着资本。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激励人民群众共同奋斗,迈向共同富裕,弘扬相亲相爱、立己达人的互主体理念,“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创新帮扶方式,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sup>[22](136)</sup>,并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准,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生产与分配良性循环、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和衷共济、众望所归的主体间关系社会。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和平发展之道,与世界现代化携手同行。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建立在侵略、凌辱、掠夺他国的基础之上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耻深重,人民饱受重重困厄之苦。中国更加坚定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勇气,理解与尊重他国追寻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的努力。历经百年不懈奋斗,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相亲相爱、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sup>[32](4)</sup>中国与世界各国是互为主体、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sup>[14](6)</sup>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中国秉持“民吾同胞”“和而不同”“谦下不争”等理念,希望与世界各国携手走向共同现代化的未来。“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sup>[33]</sup>中国提出了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的命题,为世界现代化美好前景擘画了蓝图,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打造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图景的胸襟和视野,体现出了人我统一的互主体观的优秀文化基因的现代力量。

###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形神一体、身心和谐”身心观的赓续与转化

身与心的问题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是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中华传统的“形神一体、身心和谐”的互主体身心理念反对身心两分,主张身和心是个体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身心

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完整个体的内部互为主体、各有本位、独具功能。互主体身心理念落脚在一体和谐、身心双修的成我上,在成我的基础上成他人、成万物。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中华传统互主体身心理念,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与社会协同进步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 (一) 以形神一体、和谐共存论身心关系

以身心为统一整体出发论身心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一贯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中华文明在其发端之时就强调身心之间的整体性、统一性。”<sup>[34]</sup>先贤言身必及心,言心为修身,形神互渗,构成了一个身心共同体。《尚书·洪范》列举了五种幸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sup>[27](157)</sup>,隐含了幸福建立在身心整体皆好的基础之上的观念。《周易·系辞下》指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sup>[3](375)</sup>,认为精研事物的道理并学以致用,才能安身立命、提升道德修养,将安身与修心并列讨论。同时,生命是身和心的统一体,《墨子》曰“生,刑与知处也”<sup>[14](328)</sup>,形神结合共同构成了生命和存在。《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sup>[25](635)</sup>,“人能正静者,筋肋而骨强”<sup>[25](639)</sup>,形体端正才能心地清明,心地清明又能使身体强健。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也主张身心是一个整体,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源自身体的各个器官,“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sup>[35](224)</sup>,身体各个器官各司其职,完成总的精神活动。在身心一体两面的关系中,气有着重要的沟通中介作用,诸多先贤都主张这一观点,如《淮南子》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二者伤矣”<sup>[36]</sup>,身、气、心三者各居其位、共同作用,推动着整体生命的运转。

### (二) 心与身相互依存、互为主体

先贤认为身与心是双向并起且互相调和、互相作用、相互渗透的整体。身被视为天地之间的桥梁,是生命存在的根本实体,是实现个体的道德觉悟、自身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保养身体、强身健体是身心和谐的基础,要以身涵心,不能过分放纵身体的欲望。心蕴含着个体的思维、情感、意志等要素,对调适身体、发展心境和培养人格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内心纯净、品德高尚是身心和谐的保障,修心润身才能进一步推进形神统一和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sup>[5](33)</sup>。老子认为贵身爱身、保全真性是人达成目标、承担大任的基础,但也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sup>[14](30)</sup>墨子认为身体上的物质满足是人为善的前提,倡议为政者要收农时、抓生产、创财富,为民众修心为善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当然,他也主张人应当节制物质欲望,发出了节俭能够兴盛、淫佚则会灭亡的警示。“养形必先之以物”,“有生必先无离形”<sup>[9](284)</sup>。庄子也认为物质条件是保养身体的基础,身体是保有生命的前提,指出形神相互依存、相互以养,若能依乎天理、因循自然地修养身心,就能保护身体、保全生命、养护精神、尽享天年。《黄帝内经》指出身心相互影响,身体的伤害会引起精神的损伤,精神的损伤又会引发身体的疾病,故提出“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sup>[35](935)</sup>,提倡重视身体、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以维护身体健康。孟子主张以心为主导的身心一体的理念:“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sup>[24](311)</sup>,人只有达到德才兼备的境界,才能发扬其道德的光辉。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道德修养与个体行为内在合一的基础上也十分重视精神活动,肯定人们普遍的、共有的物质需求,主张通过修心实现对人的私欲的控制。明清的泰州学派提出“尊身”理论,戴震肯定了声、色、嗅、味等身体欲望的价值,把身看作心的基础。

### (三) 内外兼修、成就自我乃不懈追求

先贤们主张通过反省内求、知行合一来达到身体强健、品德高尚之内外兼备的境界,形成个体内

部的身心和谐。所谓反省内求就是强调个体应对自身的行为、思想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 通过外在行为和内在修养来规范个人言行, 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 以实现身心的平和统一。反省内求以修养身心的方式方法很多。有先贤主张以因任自然、保有天性的方式修养形神, 如庄子认为通过“坐望”“心斋”等内向反省的方式可以洗涤自己的心灵, 达到物我两忘、心胸豁达的境界, 李翱提出“弗虑、弗思, 情则不生”<sup>[37]</sup>的“正思”修养方法, 使心不受外物和情欲的诱惑, 保持“中和”的境界。也有先贤强调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仪容举止的统一, 立志、好学、至诚、省察、慎独等均是修养身心的良好方法。与此同时, 完善身心还需要知行合一, 培养纯净、善良、宽容的内在品质, 并表现出谦和、恭敬、礼貌的外在行为。所谓“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sup>[4](1026)</sup>, 就是说专心致志、坚持不懈、知行结合方能有所成就。墨子提倡“士虽有学, 而行为本焉”<sup>[14](8)</sup>, 修养身心品德是为人的根本, 要通过身体力行来体现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致知与力行不可偏废, “知、行常相须, 如目无足不行, 足无目不见”<sup>[18](160)</sup>, 知先于行, 行重于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 认为知与行相互内含、辩证统一, “知者, 行之始; 行者, 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 ‘知’‘行’不可分作两事”<sup>[29](71)</sup>。

#### (四) 在成我基础上成就天下

“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sup>[38](102)</sup>先贤认为, 通过不断的身心修养, 人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禹一样兼济天下的圣人。修身养心不单是成就自我, 更要转化私我与小我, 最终实现成就万物的“大我”境界。“‘安定天下’是中华民族个体修养的终极目标。”<sup>[39]</sup>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sup>[23](201)</sup>等, 就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 将社会成员的身心合一与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心治身为基础, 塑造了“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 成为后世修炼身心、超越身心的模范标杆。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是身心和谐的至高境界, 是实现自我和成就万物的统一体。儒家的这一理念构筑了中华传统家国情怀的基石, 为后世的有志之士将个人的修心治身与家国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提供了深刻而智慧的指引。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 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sup>[40]</sup>的身心认知, 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sup>[7](51)</sup>的洁身自好, 张载“为天地立志, 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sup>[12](320)</sup>的远大抱负,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sup>[41]</sup>的报国之心, 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sup>[42]</sup>的爱国志向, 王冕“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sup>[43]</sup>的高风亮节, 顾炎武“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sup>[44]</sup>的天下情怀,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sup>[45]</sup>的舍生忘死等, 都将个人的修身修心与对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的抱负结合在一起, 展现出了中国人成就自我与成就天下相统一的宏大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sup>[38](71)</sup>,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sup>[32](2)</sup>。人既是实现现代化的实践主体, 也是现代化成果的受益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指导下, “形神一体、身心和谐”的理念可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契合, 形成心物统一、全面发展的身心观, 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双向互动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资源。

首先, 中国式现代化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sup>[46]</sup>。中国式现代化正确把握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建设的辩证法, 以物质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将精神文明建设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全过程,形成了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心物统一的文明观。“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的身心修养以及进一步的全面发展要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sup>[20](531)</sup>,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方位改革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涵式发展,以物的全面丰富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西方文化传统主导下的工业文明既有形态对于物质财富无限扩张的本质不同,中国道路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道路。”<sup>[47]</sup>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厚植物质基础、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以重视人的精神世界的优良传统为底蕴,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单向度的物质主义文化,注重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美德,弘扬红色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倡导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理性的消费观念,不断增强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身心健康、文化素质、知识技能和情感成熟等方面的全面提升。其中,身心和谐健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指标。“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up>[38](79)</sup>党和国家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战略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sup>[48]</sup>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引导人民形成绿色、健康、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断推进着人民群众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同时,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党和国家实施新时代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明确“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sup>[21](13)</sup>,全方位推动教育公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引导社会主体养成爱学习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sup>[49]</sup>,全面提升社会主体的道德文化素养、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各类人才,为主体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身心基础。

最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相互影响、交织前进。社会的现代化影响和塑造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sup>[50]</sup>人的存在和发展是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和整合而实现的,社会的进步推动人的发展,同时人的发展也必然要为社会进步提供服务。“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个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sup>[1](6)</sup>,中华民族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一直鼓励中国人将个人的身心修养与社会理想相统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至上的人的现代化,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升华,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与对未来的憧憬,展现了文明内在的自我更新与超越。互主体观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与哲学洞见,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活、重构和创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互主体文化基因,实现了传统与

现代的辩证统一。从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理念到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新型天人观,从传统的“群己合一、成己成人”理念到人我统一、互利共赢的新型人我观,从传统的“形神一体、身心和谐”理念到心物统一、全面发展的身心观,这一系列观念的转变与创新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协调发展。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互主体观不仅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深厚的文明底蕴与价值支撑,也能够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的视角与解决方案。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 [3] 周易[M]. 杨天才,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4] 礼记[M]. 胡平生, 张萌,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5] 老子[M]. 饶尚宽,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6] 韩非子[M]. 高华平, 王齐洲, 张三夕,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08.
- [7]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陈克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8] 王夫之. 尚书引义[M]// 船山全书: 第2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270.
- [9] 庄子[M]. 孙通海,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10]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张世亮, 钟肇鹏, 周桂钿,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1]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701.
- [12] 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13] 王夫之. 周易外传[M]// 船山全书: 第1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983.
- [14] 墨子[M]. 方勇,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5] 荀子[M]. 方勇, 李波,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66.
- [16]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7] 黄怀信, 张懋镛, 田旭东. 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53-254.
- [18] 朱子语类[M]. 黎靖德, 编,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19] 邵雍. 皇极经世书[M]. 王鹤鸣, 殷子和, 整理.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511.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23] 论语[M]. 陈晓芬,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24] 孟子[M]. 万丽华, 蓝旭,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25] 管子[M]. 李山, 轩新丽,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6] 晏子春秋[M]. 汤化,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93.
- [27] 尚书[M]. 王世舜, 王翠叶,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8]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茂元,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32.
- [29] 王阳明. 传习录[M]. 陆永胜,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30]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60.
- [32]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33]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23-10-19(1).
- [34] 成龙, 朱双鹏. 新时代系统观念的思想渊源及其价值意蕴[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3): 80-88.
- [35] 黄帝内经[M]. 姚春鹏,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36] 淮南子[M]. 陈广忠,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49.

- [37] 郝润华, 杜学林. 李翱文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19.
- [3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 [39] 成龙, 潘亚宁. 从思想源头看“胸怀天下”世界观方法论的精神实质[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6): 11-22.
- [40] 王安石. 洪范传[M]// 宋本临川先生文集: 第7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87.
- [41] 范仲淹. 范仲淹集[M]. 薛正兴, 点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9: 123.
- [42] 陆游. 陆游诗文选[M]. 李之亮, 注析.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 100.
- [43] 王冕诗选[M]. 张堃, 选注.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146.
- [44]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全校本[M]. 黄汝成,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57.
- [45] 杨国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林则徐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21.
- [4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47] 魏志奇, 朱权辉. 文明史视域下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4): 132-144.
- [48]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
- [4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48.
- [50]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150.

## Intersubjectivity perspective: The unique cultural genes and innovations embedded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ENG Long<sup>1</sup>, CHEN Chan<sup>1,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Jiyang Colleg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Zhuji 3118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subjectivity perspective, as a unique cultural gen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integrated with Marxism, and has contributed distinctive spiritual qualities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is integration i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in thre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the cosmological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the coexistence of all things”, the social relational view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nd mutual fulfillment”, and the holistic view of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and balance of body-mind”. These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ia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in terms of worldview and value system. Consequentl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reshaped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modernization and forged a new paradig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intersubjectivity perspectiv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view of nature and humans; view of self and others; view of body and mind

[编辑: 郑伟]